



# 中华文明的都城文化起源与历史传承

## ——从双槐树遗址到明清北京城

范毓周

**摘要:**对距今约5300年的河南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的聚落结构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都城建设的巅峰之作——明清北京城的布局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可以揭示二者之间跨越数千年的文化传承脉络。研究发现,“河洛古国”所展现的居中思想、等级秩序、功能分区及初步的天文宇宙观,均在明清北京城的规划中得到了极致的体现与发展。这种规划理念的惊人延续性,有力地证明了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其核心价值观念与制度范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且持续的影响,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的核心基石。

**关键词:** 巩义双槐树;北京城;都城形态;文明基因;历史传承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26)02-0061-06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都城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礼仪制度的载体和物质文明的结晶,其规划、布局与功能演变,清晰地勾勒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念与国家形态发展的轨迹,是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中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我们围绕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作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和“中原文明发展模式”的早期代表,通过对双槐树遗址与明清北京城在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及政治哲学观念方面的比较分析,揭示中华都城文明从萌芽到成熟的内在传承基因与核心逻辑。明清北京城严谨的规划格局、森严的等级秩序和宏大的宇宙观象征诸多核心设计理念,诸如居中而治的权力中心、层层拱卫的防御与区隔体系、政治与生活区域的功能分化等,都能从仰韶文化晚期双槐树遗址中找到其最原始的雏形。从双槐树的“三重环壕”到北京城的“四重城垣”,从双槐树的

“中心居址区”到明清北京的紫禁城,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清晰的、贯穿中华文明都城规划思想发展历史的演进脉络。这条脉络雄辩地证明了一种关于宇宙观、国家、权力与秩序的系统观念早在五千多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萌发,并以惊人的韧性与生命力,塑造了此后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及其外在物理表现空间。

### 一、“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的都邑形态与早期国家雏形

双槐树遗址坐落于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地处黄河南岸、伊洛河汇流处的高台之上。这一区域自古以来便被视为“天下之中”,是中华文明核心区的腹地地带。遗址的绝对年代约为距今5300—4800年,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显著加快,人口激增,聚落分化,为大型中心聚落乃至

收稿日期:2025-09-09

作者简介:范毓周,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主要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文明探源与比较、先秦社会历史文化研究。

早期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双槐树遗址以117万平方米的宏大体量及其所展现出的超乎寻常的社会组织能力,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sup>①</sup>。

双槐树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宏观结构,是其由内、中、外三道大型环壕所构成的庞大防御和区划体系。这种“三重环壕围合区域”的设计(图1),在史前聚落中极为罕见。从防御功能看,三道环壕层层设防,构成了坚固的壁垒,可以有效抵御外部的侵袭。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冲突已经加剧,安全防御成为聚落的首要考量。一个政治实体能够组织建设如此大规模的防御工程,显示其已具备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更重要的是环壕在中心区域的物理空间上分割出不同的功能与社会区域,从外到内,各区域的重要性与等级性逐渐提升。这种设计理念,将整个聚落规划成一个层层面向区域中心、有序的有机体,最核心的区域被置于最严密的保护之下。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规划,更是社会秩序的体现,标志着政治体对聚落内部不同人群、不同活动进行制度化管理的开端。三重环壕的修建需要统一的规划、精确的设计和大规模、长时间的劳动力投入。这背后必然存在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权力核心,能够调动和管理整个社会的资源。因此,环壕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彰显,是社会权力分层的结果,是“河洛古国”统治者向内、外宣示威严与权力界限的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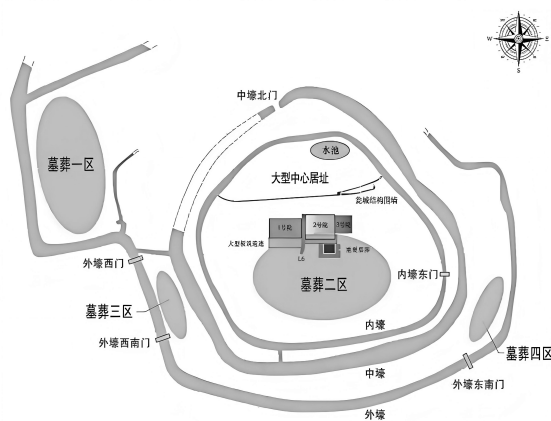


图1 双槐树遗址功能布局示意图

在三重环壕体系的拱卫之下,位于内环壕北部正中区域的大型中心居址区,是整个遗址

的权力核心区。这一区域的布局和建筑形制,为我们揭示了中国早期“宫城”的原始形态。首先,该区域由一道独立的围墙环绕,形成“城中之城”。这种“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巨型中心居址”的设计,将统治集团的居住和活动场所与普通社会成员的生活区明确隔离开来,体现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和统治者特殊地位的形成。部分大型门道遗迹呈现出“一门三道”的形制,表明开始出现蕴含等级观念的礼仪性入口,后世都城宫殿正门常设三个门道的规制与此惊人地相似。中心居址区内发现了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包括大型殿宇式建筑和庭院式建筑群。这些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体量宏大,采用先进的版筑技术,显然不是普通居所,而是用于处理公共事务、举行重要仪式的政治中心兼最高统治者的居所,可以被视为后世宫廷建筑的雏形<sup>②</sup>。其次,双槐树遗址展现了清晰的功能分区,表明其社会结构已经相当复杂,超越了一般性原始聚落的范畴。一方面是政治与生活分离。如前所述,围墙内外的布局清晰地将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与公共生活区隔离开来,已具备“前朝后宫”式功能分区的雏形。这种公私分明、内外有别的空间理念,成为后世中国都城规划的核心准则。另一方面是多样的功能区。遗址内除了核心的居住与政治事务区,还有手工业作坊区(如制陶区)、仓储区(储水设施)以及道路系统等。这表明社会分工已经相当成熟,整个聚落的经济、宗教、社会活动都处于统一的管理之下。此外在中心区大门左边还发现了独立的大型墓葬、右边发现了大型夯土祭祀台和多个祭祀坑组成的祭祀区,后世的“左祖右社”规范与其基本一致。

在祭祀区发现的由九个陶罐摆放组成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以及一些与天象崇拜相关的迹象,无疑是宇宙观的早期体现。这暗示了“河洛古国”的统治者可能已经开始将自己的权力与天命、宇宙秩序相联系。这种“观天授时”“敬天法祖”的思想,显然是中华文明王权观念和都城营建中“法天象地”思想的滥觞。

综上所述,双槐树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严谨的规划、明确的功能分区和显著的社会分层,已经具备了早期都城的诸多核心要素。它不仅

是一个防御坚固、人口众多的中心聚落,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其内部呈现的向心式布局、中轴对称的萌芽、内外区隔的等级思想以及初步的天文宇宙观和“前朝后宫”“左祖右社”的礼仪性布局,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都邑的雏形,是中华文明礼仪规制发展模式的最初范本,为中国都城礼制奠定了基础<sup>③</sup>。

## 二、“建中立极”——明清北京城的规划理念与中国都城礼制的成熟形态

都城是中国文明形态与政治文化理念的集中表达,也是中国传统礼制文化的核心呈现。后世的儒家在《周礼》中把这种向心式布局、中轴对称的布局、内外区隔的等级思想以及初步的天文宇宙观和“前朝后宫”“左祖右社”的礼仪性布局概括成一套规范化的制度。从已有考古发现恢复的历代王朝都城布局看,虽然在具体安排上,由于历代王朝在兴建京城时一般以已有的城市为基础,受到原有城市布局的各种影响,没有完全遵循《周礼》的规范,但在都城布局上都尽量呈现“建中立极”的核心理念。其中最能映照双槐树遗址布局、最符合《周礼》规范的是明代初年在政治军事稳定后重新建设的北京城。

穿越数千年的历史进程,封建社会晚期都城建设的集大成者——明清北京城,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更是一座被赋予了极高政治、礼仪和象征意义的礼制之城。其规划设计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营建思想的巅峰成就。明清北京城的整体结构,是由宫城(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垣层层相套、拱卫核心而构成(图2)。这一宏伟的都城结构,是封建王朝的社会等级政治秩序在空间上的完美投射。

北京城的核心是宫城,也称紫禁城,即今天的故宫。宫城位于全城中轴线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政务和日常居住的场所,是皇权的绝对中心。其红墙黄瓦,戒备森严,是“天子”及其附属成员的专属封闭空间,是最高统治者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离的独享区域。其中轴线是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分别是皇帝接受朝贺、

办公、皇帝与后妃生活和举行婚礼的居所,呈现出与巩义双槐树遗址已经萌发的“前朝后宫”相似的礼制格局,只是其规模更为宏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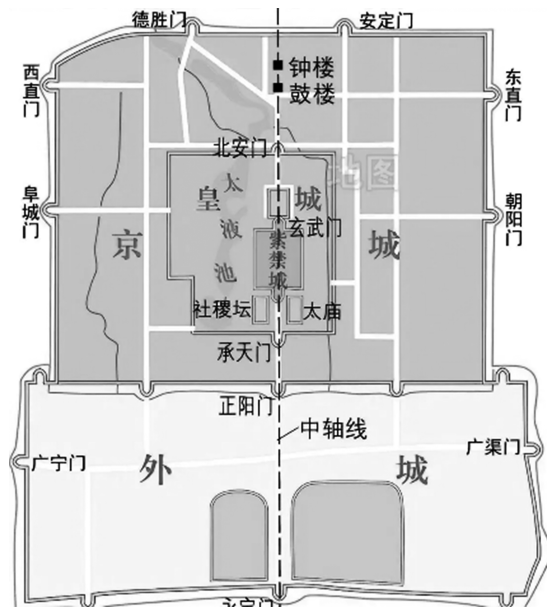


图2 明清时期的北京城结构图

皇城环绕于宫城之外,是为宫廷服务的附属区域。这里分布着皇家苑囿(如西苑三海)、内廷机构、府库和警卫部队等。而在宫城的前面两侧分布着皇家宗庙(太庙)与社稷(社稷坛),呈现出与巩义双槐树遗址已经萌发的“左祖右社”相似的礼制格局。皇城是皇家活动与供给、拱卫宫城的安全屏障区域,也是皇室成员及其服务人员的生活空间。皇城之外是内城,又称“大城”,是明代北京城的主体,清代成为八旗贵族和官僚的主要居住区。内城呈规整的矩形,街道坊巷如棋盘分布,重要的国家衙署设于宫城与皇城南面最为接近的区域。内城相当于巩义双槐树遗址最外一层壕沟,是全城防御外部敌对力量侵袭的安全保护屏障。内城之外为外城,实际上并非礼制规定的京城组成部分,是明代嘉靖年间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而增建的防卫性扩展,原计划包围整个内城,后因财力不济仅修筑了南侧一面,形成了北京城独特的“凸”字形格局。外城后来成为商业活动和市民杂居的区域。因而实际上北京城从皇朝规制上并不包括外城,仍然是三重城垣构成的都城结构<sup>④</sup>。这三重城垣如同三道同心圆,将整个北京的人口和社会阶层进行了严格划分。距离权力

中心——紫禁城的远近,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这种布局将儒家“贵贱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思想物化为坚固的城墙和明确的边界,构建了一个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王朝空间。

贯穿北京城南北的,是一条长达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它是北京城的灵魂与脊梁,也是中国古代都城“建中立极”规划思想的极致体现。北京城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向北经过天坛、先农坛至正阳门、天安门、端门,经太庙和社稷坛至午门,贯穿紫禁城的核心殿宇(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再经神武门、景山,最终抵达钟鼓楼。所有最重要的皇家建筑、礼仪建筑都被精心布置在这条轴线上。这不仅是建筑序列的铺陈,也是皇家威仪与礼制的显现。

中轴线两侧的建筑严格对称布局,无论是天坛与先农坛,还是太庙与社稷坛,都形成对称。这种均衡、对称的格局,创造出一种庄严、宏伟、和谐的视觉秩序,彰显了皇权的稳定与至高无上,是一种对称与秩序之美。中轴线不仅是地理上的中心线,更是哲学与宇宙观的象征。它代表着贯通天、地、人的“中”,皇帝作为“天子”,居于中轴线的核心位置,象征着他承天命、治万民,是宇宙秩序在人间的代理人。整个北京城围绕这条中轴线展开,就是模仿宇宙星辰围绕北极星运转的格局,是“法天象地”思想的终极表达和中华文明宇宙观的象征。这种象征与巩义双槐树遗址中以北斗九星展现崇天授时的宇宙观和哲学理念一脉相承。

作为权力核心的紫禁城,其内部布局严格遵循“前朝后寝”的古制,这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一以贯之的原则,体现了儒家礼制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严格区分。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的前朝(外朝),是皇帝举行大典、接受朝贺、处理国家政务的公共政治空间。这里的建筑宏伟壮丽,庭院开阔,气氛庄严肃穆,旨在彰显皇权的威仪和国家的强盛。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的后寝(内廷),则是皇帝与后妃的居住生活与婚礼区。其建筑风格相对亲切,庭院布局更为灵活,体现了“家”的属性。后寝区域还包括东西六宫、御花园等,

是皇室的私人生活空间。

从举行国家大典的太和门广场,到皇帝日常起居的内廷深宫,空间由开放转向封闭,由雄伟转向精致,动线与视线被层层门禁所控制。这种布局将皇帝作为“国家元首”的公共角色和作为“一家之主”的私人角色进行了清晰的物理分割,使礼制精神渗透到皇家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疑是对巩义双槐树遗址“前朝后寝”规划思想的承袭与发展。紫禁城左右的太庙与社稷坛的设立则是对巩义双槐树遗址“左祖右社”规制的发展与丰富。

北京城的功能分区是高度系统化的:皇城为宫城提供直接服务,内城为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转提供支撑,外城不受礼制规范制约,但随着城市发展承担了全国性的商业、手工业和娱乐功能。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礼仪性建筑,则分布于城区的不同方位,共同构成了国家精神信仰的空间网络。究其渊源,完全可以追溯到5300年前已形成的巩义双槐树遗址萌生的规制思想。

### 三、从双槐树遗址到北京城的传承与演变

如果将相隔近五千年、社会形态迥异的双槐树遗址与明清北京城并置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文明都城形态基因的传承与演变轨迹。北京城看似独一无二的规划成就,其核心理念的种子,早已在双槐树的黄土地上萌芽。

中国都城规划最核心理念便是“居中而治”。权力核心必须占据地理和象征意义上的中心位置,整个城市布局围绕这个核心向心展开。双槐树遗址的“中心居址区”被三重环壕所拱卫,并占据了内壕围合区域的北部正中这一显要位置。这种布局,已经明确体现了“择中立宫”和向心拱卫的早期思想。虽然双槐树遗址尚未形成如北京城那样贯穿全城的宏大中轴线,但其中心居址区内部建筑的排状布局,以及“一门三道”等带有方向性和秩序性的设计,都预示着对中轴对称原则的初步探索。明清北京城将这一理念发展到了极致。紫禁城不仅位于皇城和内城的中心,更坐落在贯通全城的南北

中轴线上。从双槐树遗址的“核心区”到北京的“宫城+中轴线”，我们看到了一个从“点状中心”向“线状-面状中心”演化的清晰轨迹，但“突出中心、拱卫核心”的根本思想一脉相承。

使用人工屏障进行防御，并以此为基础划分社会等级，是中国都城规划中另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双槐树遗址的“三重环壕”和明清北京城的“四重城垣”在功能上高度同构。它们都承担着双重任务：其一，对外防御，保障都城的整体安全；其二，对内区隔，固化社会等级。双槐树的内壕将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隔开，这正是北京城中宫城、皇城、内城之间等级划分的原始版本。从挖土为壕到筑土为墙，再到砌砖为垣，建造的技术和材料在数千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管理逻辑，以及利用物理空间来建构社会秩序的治国方略，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双槐树遗址的瓮城，作为一种增强防御和控制出入的复杂门禁系统，更是直接演变成了后世的城门，尤其是紫禁城午门等复杂门阙。

将统治者的公共政治活动空间与私人生活空间相分离，是体现礼制精神、规范权力运行的重要手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槐树遗址的聚落中心开始出现了生活区域与政治活动区域的分离。在其大型中心居址区这个“宫城”雏形内部，大型夯土殿堂基址很可能用于公共集会和仪式，其他相对小型的院落则可能是首领家族的居所。这可以被视为“前朝后寝”原则最古老的实践。到了明清北京的紫禁城，“前朝后寝”已经发展为一套成熟、固化的建筑规制。外朝与内廷以乾清门为界，功能清晰，界限分明。从双槐树模糊的功能倾向，到紫禁城明确的礼制规定，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社会管理理念从朴素、自发到精致、自觉的演化过程。

尽管核心理念一脉相承，但从双槐树到北京城，都城的规模、建造技术、社会复杂性和象征体系都经历了巨大的飞跃，这反映了国家形态从早期雏形到成熟国家的演进。从规模和建造技术角度看，双槐树遗址面积约117万平方米，其建筑以夯土和木构为主，这在当时已是惊人的成就。而明清北京城面积超过6000万平方米，建筑采用了砖石、琉璃以及彩绘等极为复

杂的工艺，其工程量和技术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从社会结构看，双槐树遗址对应的是一个区域性的早期国家或强大的部落联盟，社会分层初现；北京城则是一个统治着亿万人口、拥有庞大官僚体系的统一国家的神经中枢。从象征体系看，双槐树遗址的“北斗九星”图样表明了早期朴素的宇宙观与王权的结合；北京城的规划则是一整套成熟的、系统化的宇宙哲学——天人合一、五行八卦、法天象地思想的全面物化。中轴线、天坛地坛、左祖右社等设计，共同构建了一个严丝合缝的象征符号网络，将皇权合法性与宇宙秩序紧密捆绑。

这种演变清晰地展示了中华文明国家治理能力的持续提高和思想体系的不断深化。双槐树遗址是源头，它提供了核心的“基因”；而北京城是长河的入海口，它汇集了数千年发展的成果，将这些基因表达为最壮丽辉煌形态。

## 结 语

通过对距今约5300年的双槐树遗址和明清北京城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华文明的都城发展史，呈现出一条逻辑清晰、核心理念高度统一的传承轨迹。明清北京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终极范本，其所彰显的居中而治的向心布局、内外有别的等级区隔、前朝后寝的礼制空间以及法天象地的宇宙观念，都可以在遥远的“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中找到其最坚实、最古老的源头。

从双槐树的土筑环壕到北京的巍峨城墙，从早期首领的中心居所到明清皇帝的紫禁城，从朴素的北斗崇拜到系统化的国家祭祀体系，这些不仅是建筑技术和城市规模的巨大进步，更是一种核心政治-文化理念的顽强延续与不断精致化。这个核心理念，就是将国家权力置于一个层层拱卫、秩序井然的宇宙模型中心，通过物理空间的规划来塑造和强化社会与政治的等级秩序，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场跨越五千多年的对话，雄辩地证明了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地区，巩义双槐树遗址形成的“文明发展模式基因”具有深远

的影响力。它所奠定的以“中”为核心、以“礼”为框架、以“序”为目标的建国与营都思想,成为中华文明最稳定、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基因之一。在双槐树的夯土台基之上,我们仿佛可以眺望到明清北京城的殿宇轮廓;而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回溯,其精神源头直指伊洛河畔那片古老的土地。这正是中华文明强大连续性的生动体现。“河洛古国”所展现的居中思想、等级秩序、功能分区及初步的天文宇宙观,均在明清北京城的规划中得到了极致的体现与发展。这种规划理念的惊人延续性,有力地证明了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其核心价值观与制度范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且持续的影响,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的核心基石。

笔者在多年前曾经指出,中华文明形成的格局是多源一体的,而非多元一体,就中国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而言,无可否认,中原文化是处于中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的<sup>⑤</sup>。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反映了先民们在地处黄河中下游的

中原地区长期繁衍、生息,不断劳作、发展,在汲取了相邻地区的诸多文化因素后,具备了进入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最终催生出彪炳于世的中国早期文明。

巩义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一种文明的核心观念一旦形成,便能穿越漫长的时空,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呈现,最终塑造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共同记忆与身份认同。从双槐树遗址到明清北京城,这不仅是一部建筑史,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呈现史。

#### 注释

- ①《“河洛古国”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历史》, <https://news.qq.com/rain/a/20200508A0A0TW00>。②③范毓周:《河南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浅论》,《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④徐苹芳:《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载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第一辑,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121页。⑤李学勤、范毓周:《早期中国文明·前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 The Origin and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Capital Cultur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the Shuanghuaishu Site to Beijing C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an Yuzhou

**Abstract:** If we conduct an in-dept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ettlement structure of the “Heluo Kingdom” site in Shuanghuishu, Gongyi, Henan Province, dating back approximately 5,300 years, and the layout of Beijing C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pinnacle of the late feudal Chinese capital construction, and it reveals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connection spanning millennia between the two.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enter ideology, hierarchical order, functional zoning, and the emerging astronomical and cosmological concepts demonstrated in the Heluo Kingdom are all manifested and developed to the extreme in the planning of Beijing C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remarkable continuity in design principles strongly proves that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centered on the Heluo region, as the primary compon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exerted a profound and enduring influence, laying the core foundation for the “unity in diversity” patter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the Shuanghuaishu Site in Gongyi; Beijing City; capital construction; civilizational genes; historical inheritance

[责任编辑/启 轩]